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卫生防疫

温金童 李飞龙

内容提要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深刻复杂的历史原因,陕甘宁边区疫病横行,人畜死亡率很高。这对于陕甘宁边区最大限度地集中人力、物力,发展生产,坚持抗战,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十分不利。面对这一严峻现实,边区政府通过多种渠道,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制定了卫生防疫的方针政策,大力开展卫生宣传,建立健全了一系列卫生组织,使广大群众学到了卫生知识,增强了卫生观念,从而使边区的人畜发病率、死亡率都逐渐下降,其中的经验教训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抗战时期 陕甘宁边区 卫生防疫

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的研究,多年来一直长盛不衰,这方面的论述十分丰富。但对边区的卫生防疫工作,学者却涉及较少。这方面的论著仅见卢希谦、李忠全的一部专著和孔淑真、梁烈庭的几篇关于边区卫生情况介绍的文章。^① 笔者拟就陕甘宁边区的卫生防疫工作进行初步的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① 卢希谦、李忠全:《陕甘宁边区卫生史稿》,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孔淑真:《陕甘宁边区的妇幼卫生事业》,《陕西卫生志》1985年第3期;孔淑真:《陕甘宁边区防疫工作的成就》,《中华医史杂志》1991年第2期;梁烈庭:《陕甘宁边区的卫生防疫及卫生运动》,《陕西卫生志》1985年第2期。

一 边区卫生防疫面临的问题及成因

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在《关于文教工作的方向》一文中指出：“疾病与死亡威胁着广大群众，某些地区，婴儿死亡率高达 60%，成人死亡率高达 3%。”^① 从 1944 年 1 月到 4 月延市共死去市民 108 人。娃娃多死于破伤风，婆姨多死于产后风，成年男子多死于伤寒、回归热、肺炎等急性发热的传染病。^② 志丹县侯家河湾 3 年人口死亡率平均为 9.2%，延安市新正区死亡率达 10%。在死亡人口中婴儿之死亡较成人更大。据对志丹、安塞、子长部分地区的调查，188 个妇女共生婴儿 1028 个，死去 645 个，死亡率高达 67.2%。而甘泉杨庄窠共出生婴儿 30 个，而同期死亡 1 周岁以下小孩儿则为 38 个，为出生数的 126%。延安县 1 至 5 月因传染病而致死亡者即达 2016 人，占全县人口的 3.2%。边区当时平均寿命只有 10 岁。生育率和死亡率均占当时世界第一位。^③ 牲畜的疾病死亡，也是一个极端严重的问题。“1941 年春，靖边因羊瘟而死羊就有 20000 余头，1942 年定边羊瘟死羊 16000 余头，1941 年夏，延安牛瘟死牛 500 余头，1942 年志丹夏秋牛瘟死牛 574 头”。^④ 以 1943 年为例，牛的死亡率即占繁殖率的 61%，羊的死亡率占繁殖率的 81%。^⑤ 这些数字触目惊心，其产生的原因也是深刻复杂的。

① 李鼎铭：《关于文教的工作方向》，《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 8 辑，档案出版社 1988 版，第 458 页。

② 傅连璋：《群众卫生工作的一些材料》，《解放日报》1944 年 4 月 30 日。

③ 张潮：《结束愚昧迷信的生活》，《解放日报》1944 年 8 月 1 日。

④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卷五，东北书店 1948 年版，第 778 页。

⑤ 《关于加强牲畜保健工作的决议》，《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 8 辑，第 437 页。

(一) 社会经济文化的落后。边区以前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区域,广大的人民在经济上受着封建的残酷剥削,在政治上受着非人的压迫与奴役,因之影响到人民在文化上落后到几乎想不到的程度。据统计,“平均起来,全边区识字的人仅占全人数的1%,小学只有120处,社会教育则绝无仅有”。^①李维汉也指出,由于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使分散落后的农村经济一直处于停滞状态,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都很不发达,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统治着广大乡村,成千上万的农民终日辛劳难得温饱。方圆几十里找不到一所学校,穷人子弟入学无门,文盲高达99%。^②这就使得边区的经济文化都非常落后,卫生条件极差,缺医少药,这是边区人畜大量死亡的深刻的社会原因。

(二) 不良的卫生习惯。由于经济文化的落后,长期以来边区民众的不良卫生习惯根深蒂固,边区防疫委员会于1942年6月调查延安胃肠道病一年四季都在发生的原因,得出结论认为:一是饮水不洁,二是厕所不卫生,而主要属思想认识问题。防疫委员会又对市区环境卫生、饮水、水源进行了调查,发现很多地方水源很差,污染严重,周围有污水、畜粪可流入井中。不少老百姓认为把牲畜圈起来养影响其生长,经常洗衣服会损坏、浪费衣服等。这直接导致了大量可以预防的传染病流行,引发居民死亡。如“因喝生水、吃腐败的或蚊子叮过的食物而引起的肠胃传染病(伤寒、痢疾、吐黄水病等);因剪脐带不洁而往往引起婴儿破伤风,常年不洗澡、不洗衣、不晒被而引起(斑疹、伤寒、回归热等)虱子所传染的各种病

① 社论:《为扫除3000文盲而斗争》,《新中华报》1939年4月19日。

②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版,第566页。

症尤为普遍”。^①

(三) 抗战时期, 边区巫神盛行, 接生知识贫乏, 这是造成妇女婴儿大量死亡的主要原因。文化的落后导致边区巫神猖獗。“全区巫神高达 2000 余人, 招摇撞骗, 危害甚烈”。^② 巫神利用迷信欺诈群众, 伤财害命。“延安县共有巫神 200 余人, 对其中 59 个巫神致死人命进行调查, 共治死 278 人。华池温台区一个行政村 49 户 300 多人, 每年每人迷信消耗粮食达 3 斗零 8 合”。^③ 接生知识的贫乏使妇女分娩时常出现一些不可思议的荒唐事。由于缺乏妇产医生, 产妇生孩子, 多由接生婆接生, 用不消毒的剪刀或浆杆(一种植物) 割剪脐带。产妇遇到难产就请巫医跳大神, 往往导致死亡。产后在炕上撒些土或草木灰, 产妇三天三夜不能躺下睡, 只能坐在灰袋子上, 喝些稀米汤, 三天后她也不许吃有营养的东西, 说怕产妇吃了肚子疼。^④ 这种陈规陋习, 是导致新生儿感染破伤风而大量死亡的罪魁祸首, 也是孕妇感染产后风、营养不良的重要原因。

(四) 牲畜的死因。牲畜大批死亡, 除受上述因素影响外, 主要在于棚圈不洁, 缺乏草料。或者根本就没有棚圈, 任由雨雪淋冻, 以至生病。或生病后不立即医治而是祈求于棚神、圈神保佑, 耽误了医治时间。或者病死的牲畜不是加以掩埋, 而是进行宰杀食用, 以至造成疾病在牲畜中迅速蔓延, 带来严重的后果。^⑤

(五) 边区各级政府重视不够。在抗日战争的严峻环境里, 为

① 《开展群众卫生医药工作的决议》,《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 8 辑, 档案出版社 1988 版, 第 430 页。

②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 版, 第 566 页。

③ 短评:《巫神罪恶小统计》,《解放日报》1944 年 8 月 11 日。

④ 白茜:《陕甘宁边区的妇女运动》,《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90 版, 第 462 页。

⑤ 《关于加强牲畜保健工作的决议》,《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 8 辑, 第 437 页。

了求得生存坚持抗战,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边区政府更多地把精力放在政治、经济、军事工作方面,而对卫生防疫工作重视不够,在相当一段时间未能采取有力措施。《延安防疫委员会总结卫生防疫工作》指出:“一些机关负责同志卫生防疫观念比较淡薄,或因忙于其他事务,未能很好注意本部门的卫生工作,致使一些卫生设备徒有虚名,而无实效。”^①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也承认:“关于民众卫生医药工作,我们曾经犯了疏忽的错误,迄未予以重视……今后尤应重视卫生工作。”^②这使边区民众在丰衣足食之后,又苦于疫病的困扰,担心子嗣不旺,感叹财旺人不旺。

二 卫生防疫的方针政策

陕甘宁边区疫病肆虐,人畜的死亡率高,这对于边区最大限度的集中人力、物力,发展生产,坚持抗战,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是非常不利的。党中央和边区政府逐步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朱德总司令在延安各界卫生动员大会上说:为了打赢卫生防疫这场持久战,陕甘宁边区党和政府集思广益,采纳各方面的合理建议,出台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制定了多项卫生法规开展全边区的医药卫生运动,同病疫流行的现象做斗争,做到“人与财旺”,好把日本法西斯打倒。^③为边区卫生防疫工作的开展,指明了方向,打好了基础。

(一) 确立卫生防疫工作的重要地位。1939年1月在陕甘宁

① 《延安防疫委员会总结防疫卫生工作》,《新中华报》1940年7月26日。

② 林伯渠:《边区民主政治的新阶段》,《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8辑,第451页。

③ 《开展全边区卫生运动的三个基本问题》,《解放日报》1944年7月10日

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崔曙光、罗成德等 18 名参议员联名提出了“建立边区卫生工作保障人民健康案”。议案主要内容是:“边区地广人稀、气候干燥、文化落后,虽自土地分配后,人民生活已有较大的改良,卫生文化亦稍建设,但以人员缺乏,财力支出仍不敷需要,因之,卫生保健工作,亟应建立。”同时提出了实行这一议案的具体办法:“(1)广泛开展护林植树工作,用以调节水量转变气候;(2)提高人民卫生知识,实行清洁运动,注意个人与民众的卫生;(3)在各县城及较大区镇,设立医药房,以从事防疫和治疗;(4)由各县选派适当青年,入卫生学校,用为各地卫生干部;(5)破除迷信、取缔巫医,保证人民健康。”^①该提案在边区参议会上被通过,说明保障人民身体健康问题引起了边区政府的重视。于是,开展卫生防疫运动被提上了边区的议事日程。由此不仅确立了卫生防疫的重要地位,而且出台了一系列卫生防疫政策。

1939 年 4 月 7 日《新中华报》发表《把卫生运动广泛的开展起来》的社论指出,“我们以后必须更广泛有计划的在全边区来热烈地进行卫生运动。把这一运动和抗战与生产更密切地联系起来,使之有更大的收获,今后我们的工作方针应该:(1)广泛的进行卫生教育,使全体军民对卫生运动有自觉的注意,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配合着物质生活的改善,这将使边区人民健康,对抗战胜利是重要保证之一。(2)制订适合于实际情况的卫生法规。(3)定期举行清洁运动,有计划地改良环境卫生,普及必要的卫生设施。(4)训练大批的卫生人员,分布于各个地区,从事于保健工作的推行。(5)强迫施种牛痘与注射防疫针。”社论最后号召军民把卫生运动广泛地推动起来,并特别指出“这是不可或缺的伟大的抗战工作的

^①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内部资料),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学编辑组 1984 年编印,第 150 页。

一部分”。1941年5月30日创刊不久的《解放日报》又以《边区政府委员会议讨论卫生工作》为题发表文章,明确指出:“卫生工作,应从机关、部队、学校、团体做起,建立模范的作用,用实际的影响,逐步推广到一般的居民。”1944年7月10日《解放日报》又发表了《开展全边区卫生运动的三个基本问题》的社论。指出:首先教育党、政、军及群众团体的干部,使他们懂得推广群众医药卫生工作的重要意义,及自己对于减少人民疾病所应负的责任;其次利用各种活生生的事实,深入农村中进行卫生宣传,去改变广大农民众不讲卫生的旧习惯;第三,在中西医密切合作打倒巫神的方针下,大批培养边区医药卫生工作干部。运动深入开展后,1945年4月24日《解放日报》又发表了《继续开展卫生医药运动》的社论,明确规定:开展群众卫生运动,普及医药,改造巫神,改进牲畜管理,是今后卫生防疫运动的四项基本任务。

(二) 确立了“预防为主,医药为辅”的基本方针。1942年9月5日《解放日报》在《加强干部保健工作》一文中,明确提出“预防胜于治疗”的口号。认为“预防胜于治疗,就是说不叫人生病,那是上策”,并要求“各级卫生组织,从卫生部、处,直到卫生科、所,要把保健工作,列为自己的主要工作,纠正过去重医疗轻保健的作风”。强调“我们要更主动地向疾病和死亡作斗争”。

1942年11月14日《解放日报》发表了《重视防疫》的社论。1943年5月31日《解放日报》又发表了《夏季防疫工作》的时评和其它预防疾病知识的科普文章。这些重要社论及科普文章的发表,对宣传群众,动员群众,提高民众的防病意识,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夏季防疫工作》的时评文章,总结了边区开展防疫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同时批评“一些卫生机关与同志,还没有认识清楚防疫工作的重心,还多多少少保留一些只注意治疗,不注意预防的观点”,认为“这是防疫工作的一个障碍。”要求“各个卫生行政的领导

部门要注意纠正这种错误观点,不仅要认真治疗已患传染病人,而且主要的要积极预防传染病的蔓延和发生”。^①边区民政厅厅长刘景范同志强调说:“加紧预防工作是每个卫生机关的职责。”^②当时的延安市委副书记马豫章也指出:“卫生机关特别是卫生合作社的业务方针应以积极的预防为主,治疗为辅。”^③

(三)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卫生法规。早在1938年4月30日,《新中华报》就推出了“防疫”专栏,规定了八条注意事项:“1、保持水井河深清洁,禁止在河里井水里洗澡;2、经常保持室内外清洁,防止苍蝇发生传播病毒;3、垃圾污物不可堆积,须随时扫除;4、绝对不喝凉水,不食生冷的食物;5、一切饮水食物须煮沸后再食;6、防止汉奸潜入散布毒菌(特别注意由敌方来之携带瓶或其他器具者);7、防止汉奸贩毒贩卖含毒物质;8、努力扑蝇运动,防止传播病毒。”^④1940年3月12日八路军军医处召集各卫生机关举行了防疫会议,专门制定了八项卫生纪律要求广大群众共同遵守:“1、不要室内吐痰;2、不要随地大小便;3、不要到处倾倒垃圾;4、不要对人脸咳嗽;5、早晨要洗脸刷牙漱口;6、不喝生水,不吃冷食;7、自己有病不要接触别人;8、病人要隔离。”^⑤

边区各地从机关到农村也普遍的制订了相应的卫生计划或卫生公约。如1944年夏季,合水县卫生防疫委员会成立后即制定了公共卫生计划:(1)每家大门要刷洗成蓝色或黑色;(2)选择适当的地点建设公共厕所,动员的口号是大家出钱,大家出力,并拟订册

① 时评:《夏季防疫工作》,《解放日报》1943年5月31日。

② 刘景范:《陕甘宁防区防疫委员会五个月来的工作报告》,《解放日报》1942年10月29日。

③ 马豫章:《延安市半年来的群众卫生工作》,《解放日报》1944年8月13日。

④ 《防疫专栏》,《新中华报》1938年4月30日。

⑤ 《军医处召开防疫会议》,《新中华报》1940年5月17日。

子登报鸣谢；(3) 建立加盖垃圾坑若干；(4) 每家门口要打扫干净，有空地可移植花树，城关半月大扫除一次，并指定市场、空街、小巷打扫人；(5) 命令河上游不准泡牛皮，吃水要掏井、泉、水池；(6) 死牛、瘟猪不准出卖，死后要埋在庄稼地里，不准扔在山谷或居民附近，否则一定处罚教育等。上述规定初犯者可批评教育，三次以上者要写在墙上指责。而群众最害怕上报、上墙批评，因此这些卫生公约所起的效果极为显著。^①

1944年11月16日，边区文教大会通过了一系列专项决议：《关于加强工厂文教工作的决议》指出，“职工的健康是工厂最宝贵的最易受损失的资本，应该认真加以保护”^②；《关于机关学校文教工作中几个问题的决议》明白说明，“机关学校的医务人员，应与总务部门配合，亲自动手，发动群众，造成群众性的卫生运动”^③；《关于开展群众卫生医药工作的决议》更是强调指出，“要扑灭大量的死亡，第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普遍的开展卫生运动”^④；《关于加强牲畜保健工作的决议》则要求“为开展普遍的牲畜防疫运动，克服牲畜的大量死亡而斗争”。“进行这一工作的正确方针应该是中西兽医合作，着重防疫，同时加强治疗”。^⑤这些法规、办法、命令、条例针对性强、适应性广，简单易行，渐渐为广大群众所接受。

三 防治措施

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极大地促进了边区的经

① 刘凤阁主编：《陕甘宁边区·陇东的文教卫生事业》（内部资料），第75页。

② 《关于加强工厂文教工作的决议》，《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8辑，第428页。

③ 《关于机关学校文教工作中几个问题的决议》，《解放日报》1945年1月14日。

④ 《关于开展群众卫生医药工作的决议》，《解放日报》1945年1月8日。

⑤ 《关于加强牲畜保健工作的决议》，《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8辑，第437页。

济发展,为卫生防疫运动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毛泽东“加强群众卫生工作,要做到人财两旺”^①的讲话的推动下,边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逐步改善了多年落后的卫生状况,降低了人畜死亡率。

(一)运用了多种宣传方法,加大卫生宣传。关于做群众工作,毛泽东明确指出:“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②由于当时边区群众的思想观念落后,迷信和不讲卫生的习惯由来已久,只有加强卫生宣传教育,提高群众的认识,才能使广大群众自觉地起来同愚昧和不良的卫生习惯做斗争。陕甘宁边区党和政府自始至终都十分注意卫生宣传教育,运用了多种宣传方法,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第一,充分发挥媒体、小册子的宣传作用。《新中华报》多次宣传卫生工作的重要性,1939年4月7日《新中华报》发表《把卫生运动广泛的开展起来》的社论指出,日本过去在东北,现在在一切占领区域,大量贩卖红丸、白面、海洛因,便是它不特要亡我国家而且要灭我种族的铁证,因此,我们今天,必须要讲究卫生,健全身体来打倒企图毒化中国,摧毁我民族健康灭我种族的日本帝国主义。^③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报》创刊后,专门开辟了卫生宣传专栏,定期刊登各地区的卫生工作报告、成绩和卫生工作经验;请医药专家撰写防病常识,介绍各种传染病的防治办法,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边区卫生处还先后印发了“军民手册”2000份,“传染病防疫问题”100册,“防疫须知”300册,防疫传单8种^④,使边

① 白茜:《陕甘宁边区的妇女运动》,《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第46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897页。

③ 刘凤阁主编:《陕甘宁边区·陇东的文教卫生事业》,第601页。

④ 时评:《边区半年来卫生工作开展》,《解放日报》1942年10月4日。

区人民懂得了一些卫生常识,认识到不讲卫生的严重后果,逐步养成了讲卫生的好习惯。

第二,宣传方式灵活多样。边区卫生处充分利用当地农村庙会,分赴各地,组织秧歌、戏剧为群众宣传卫生常识。如庆阳桃花山三月初一庙会,即有陇东中学、庆阳完小联合组成的秧歌队,又有庆阳八一剧团分别演出的秧歌和戏剧,教育群众讲卫生;助训班的十几个女同志分散在妇女群众中讲解怎样生娃娃,都很受群众欢迎。^①为了把卫生宣传和文艺表演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西北局宣传部、边区文协、西北文工团、民众剧团、边区群众报、教育厅、中央出版局等单位联合开会决定:文工团等下乡演出时,卫生署派医生助产人员配合工作;下乡剧团除做卫生宣传外,帮助地方做卫生建设;庙会宣传的主要对象是妇女,工作重心亦一部分以妇婴卫生和饮食卫生为主,宣传反巫神为辅。^②这样就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达到了卫生宣传的目的。

第三,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发挥先进人物的模范带头作用。卫生宣传仅靠专业人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同各地的先进人物相结合,广泛发动区乡干部、劳动英雄、变工队长、小学教员等积极分子起来进行深入宣传。杨家湾小学教员陶端予就是其中的典范,即当教员又当宣传员,还是卫生员,使该村成为卫生模范。^③她们在开展每一件工作前先进行座谈,讲清为什么这样做的道理,使群众弄清道理就容易接受,干劲也会增大。

第四,举办形式多样的卫生知识展览会。展览会的挂图、统计

① 李天民:《庆阳桃花山庙会上宣传植棉卫生》,《解放日报》1945年5月5日。

② 《医务工作与宣传工作配合进行,边署召集宣传机关讨论》,《解放日报》1945年5月18日。

③ 卢希谦、李忠全:《陕甘宁边区医药卫生史稿》,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版,第141页。

表格、生理解剖等,形象直观,加以介绍很容易被群众接受。1940年“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在边区举办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妇女卫生展览会,引来许多人参观。一位中年妇女听到剪脐带,假如可能最好将剪刀消毒,不能消毒也要用开水煮过时,她后悔自己的孩子夭折不仅是因为没用剪刀,反而是她婆婆用一块碎瓦片将脐带割断造成的。^①这次展出从中央礼堂转到延安大学礼堂,参观者达万人以上,使广大群众从思想上认识到妇婴卫生之重要。

第五,事实胜于雄辩,让事实说话,让医疗实践本身的效果说话,往往具有更强的宣传效果。随着边区卫生运动的开展,许多群众的疾病转危为安。特别是新法接生使婴儿成活率大大提高,因此,确凿的医疗效果使越来越多的群众信医不信巫神了,同时也进一步认识到巫神的严重危害性。边区开展的崔岳瑞运动^②,为群众不信鬼神树立了榜样,使定边卜掌村成为卫生模范村,该村又宣传别村,推动了卫生工作的进展。通过反巫神宣传,巫神觉悟后以自身体会来宣传如何骗人,从而使巫神逐渐匿迹了。可以说,边区的卫生宣传是相当成功的。

(二)建立健全卫生防疫组织。一项工作,尤其像卫生防疫这样涉及面极广的工作,要想顺利完成,首先要依靠健全的组织。1940年3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防疫会议。5月26日成立了延安防疫委员会,由中央组织部、边区政府、延安市府、留守兵团、后方勤务部、边青救、边妇联、抗大、卫校等党政军及群众团体代表33人组成,李富春同志任主任,刘斗争为副主任,蒋仁山为秘书。该会为延安防疫运动之最高机关,负责延安市、县境内的防疫卫生

① 郁文:《在妇女生活展览会上》,《新中华报》1940年3月29日。

② 指定边县卜掌村中医(县参议员)崔岳瑞能深入群众,调查揭露巫神骗人的伎俩,成为边区卫生运动的模范个人,被誉为崔岳瑞运动。

工作。并决定在大的机关单位及区乡级按其具体情形之需要成立防疫分会，领导所属各单位之卫生防疫运动。延安军事机关防疫分会首先成立。接着，延安市防疫委员会成立，王治国任主任。^①据1940年7月26日《新中华报》报道：“在此期间，各单位已成立了防疫分会，健全了组织。各机关、部队、学校、医院、群众团体加强了厨房、厕所的建设，挖了污水坑、垃圾坑，环境卫生清洁，个人卫生比前进步。许多单位实行分餐制，整顿市容，预防接种率达80%。”^②1941年4月，边区卫生厅召集了八路军兽医院、边区卫生处及光华农场的代表开会成立了家畜防疫委员会，商讨边区家畜防疫暂时办法，推动了家畜防疫工作的开展。^③

1942年4月28日，陕甘宁边区正式成立防疫总委员会，民政厅长刘景范为主任，李志中为秘书。该会负责筹划管理全边区的防疫工作。延安市40里以内党政军民防疫卫生事项之进行，于总会下设四个防疫分区委员会，将八路军总卫生处、留守兵团卫生处分别划定区域负责各该区的防疫工作。这样的组织形式，不分中央、军队、地方机关，凡在该区者都由防疫分区委员会主管，是带有分片包干的性质，使延安防疫工作落到实处。1944年3月22日，延安市总卫生委员会成立，随后各区乡也都成立了卫生委员会，这样就把边区卫生防疫工作深入到了基层社会，形成了以延安为中心，辐射整个陕甘宁边区的卫生防疫体系。使群众卫生工作和行政工作有力地结合起来，极大地推动了边区卫生防疫运动。

(三) 培训医务人员，充实卫生设施。为了把卫生防疫工作落到实处，边区政府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尽量充实卫生设施。积极

① 通讯：《延安防疫委员会成立》，《新中华报》1940年5月31日。

② 延安防疫委员会：《总结防疫卫生工作》，《新中华报》1940年7月26日。

③ 通讯：《民政厅开办家畜防疫训练班》，《新中华报》1941年4月13日。

培训医务人员。1940年5月14日,边区政府扩大充实了原有医院、卫生所,增加了医疗部门的容量。1941年4月13日,“中财部卫生所和边区卫生所合并改组为边区卫生处门诊部。各卫生学校也添设了门诊部,方便附近居民看病”。^①与此同时,“牛瘟血清,羊猪瘟血清,血清疫苗的研制开发,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②为解决医务人员缺乏问题,边区各地纷纷举办了“助产训练班”、“接生训练班”。^③1945年5月,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与边区卫生署合办助产训练班,学员45名,学习期限10个月:其中讲课和医院学习3个月,下乡实习7个月。她们分赴10余县市用新法接生68例婴儿,产前检查126名;创办接生班6处,培训接生员367名;给儿童接种牛痘638例。文教大会后两年间,边区在农村开办接生班64处,培训接生员、改造旧产婆826人,已基本实现每区有一个助产员,2—3个行政村有一个接生员,并有73%的地区推行了新法接生。^④所有这些,都保证了广大妇女儿童的健康,降低了母婴的死亡率。

(四)初步建立了卫生防疫的预警机制。为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更好的做好卫生防疫工作,陕甘宁边区防疫委员会在防疫治病实践中逐步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防控传染病的预警机制。1942年5月13日通过的《预防管理传染病条例》,将传染病共分为两类:指定鼠疫、霍乱、天花为第一类,此类传染病经诊断后,于24小时内用电话电报报告本会;伤寒及副伤寒、赤痢、斑疹伤寒、回归热、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白喉、猩红热为第二类,此类传染病应

① 消息:《新中华报》1941年4月13日。

② 《关于加强牲畜保健工作的决议》,《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8辑,第438页。

③ 通讯:《关中助产训练班开学》,《解放日报》1944年6月14日;《延市西区成立接生训练班》,《解放日报》1944年6月15日。

④ 孔淑真:《陕甘宁边区的妇幼卫生事业》,《陕西卫生志》1985年第3期。

按周报告。遇第一类传染病发生,经委员会确实诊断后,得即时限期断绝发病区域之交通,实行病人隔离等,病人应即送医院,无医院设备处,必要时得由防疫会协同地方设立隔离病院。^①1943年1月10日,陕甘宁边区防疫委员会下发了两个通知:《为防止回归热及斑疹伤寒的通知》要求“遇有发热病人,即时送医院治疗,如医院已诊断为斑疹伤寒或回归热,应及时将和病人接触的人,一齐洗澡灭虱,以杜传染”。^②《为防止急性呼吸系统传染病的通知》要求“调整本机关内住房的人数,特别注意过集体生活的窑洞及住房,使每人的床位最好相距三市尺以上,最好是头对头,脚对脚的睡,这办法对于几个人共住一炕的地方尤为重要”。^③1943年6月10日,中央总卫生处又下发了两个通知:《为预防小儿痢疾和腹泻肠炎的通知》要求“一遇小儿发热、腹泻,即时与其他小儿隔离,停止或减少他日常的食物,多给开水喝,他的大小便要铺撒上石灰,尿布要用开水煮过消毒,并及时来中央医院小儿科,照规则挂号门诊”。^④《预防伤寒痢疾急性胃肠炎(泻肚)的紧急通知》要求“保证一切工作人员有足够的开水喝,并有开水洗碗筷,漱口。外勤人员应设法带着开水在路上喝”。^⑤为了对各种疫病能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边区卫生防疫主管部门还经常组织大批医疗队下乡巡回,发现疫情,立即前往救治。一旦某地发现疫情,卫生部门首先发布疫情通知,以引起各方面注意,号召积极防范;然后组织医护人员前往疫区巡视、调查、指导防病工作,如甘泉和延安东二区发生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后,边区政府立即封锁发病区;对

① 卢希谦、李忠全:《陕甘宁边区医药卫生史稿》,第130页。

② 刘凤阁主编:《陕甘宁边区·陇东的文教卫生事业》,第606页。

③ 刘凤阁主编:《陕甘宁边区·陇东的文教卫生事业》,第607页。

④ 刘凤阁主编:《陕甘宁边区·陇东的文教卫生事业》,第608页。

⑤ 刘凤阁主编:《陕甘宁边区·陇东的文教卫生事业》,第609页。

延安附近机关学校停止集会和报告；由疫区来延之人，不论病否均予以 10 日之隔离；对发热及疑似者亦严格隔离；立即派员赴发病区医治并调查其原因，以最快地扑灭病象。^① 笔者将其归纳为下表，以便读者更清晰的认识当时的卫生预警机制。

表 1: 陕甘宁边区防控传染病的预警机制

步骤 疫病类型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第四步
一类传染病	一天一报	卫生防疫部门发布疫情通知，提醒群众做好预防工作。	隔离病人和疫区来延安之人，必要时封锁疫区。	防治结合，扑灭病象。
二类传染病	一周一报			
其它传染病	酌情报告			

这样，边区就初步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卫生防疫预警机制，在控制恶性传染病的迅速蔓延，及时救治患者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五) 中西医结合，互相促进，提高医疗效果。在当时边区医药界存在着门户之见，中医和西医互不团结，不结合，彼此看不起，从而造成这样一种局面：医院里没中医，农村里没西医。针对这种现象，毛泽东批评说：“新医当然比旧医高明，但是新医如果不关心人民的痛苦，不为人民训练医生，不联合边区现有的 1000 多个旧医和旧式兽医，并帮助他们进步，那就是实际上帮助巫神，实际上忍心看着大批人畜的死亡。”^② 根据毛泽东的批评意见，边区卫生处提出了“中医科学化，西药中国化”的口号，并规定西医应主动与中医合作，用科学方法研究中药，帮助中医科学化，共同反对疾病死亡和改造巫神。中医应努力学习科学、学习西医，分析自己的秘方

① 卢希谦、李忠全：《陕甘宁边区医药卫生史稿》，第 139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版，第 1012 页。

和经验。边区最早实践中西医结合的是光华药厂与延安医科大学,1941年6月两家联合组建了中西医研究室,以科学态度共同研究医药制造,收到较好效果。随后毛泽东加以总结提倡,李鼎铭予以推广,这样边区实现了中西医的结合。实践表明:中西医结合治病,疗效显著提高。例如给患有肺结核的魏善钊用西药治疗半年未好,服中药11剂痊愈;徐特立夫人曾患乳结核久治不愈,服中药(七叶一枝花)就好了,这使西医信服中药的效能。中医土法接生影响婴儿健康,中医大夫主动学习新法接生。中西医结合,明显改善治疗效果,缩短了治病疗程,有力地推动了边区卫生防疫运动的开展。^①

(六) 加强营养,增进体质,提高人民群众的免疫力。过去边区经济落后,人民营养不良,体质普遍较差,这也是疾病多发的原因。在大生产运动开展以后,人们逐渐走向丰衣足食,粮食、蔬菜、肉类都能自给。卫生部门曾专门成立营养委员会,对于吃饭时间也做了科学规定,并抽调各机关、部队、学校、团体食堂厨师集训,提高烹饪技能及卫生知识,以利于伙食的改善。边区民政厅长刘景范多次号召人民尽可能多食蔬菜,多食豆制品,讲究粗粮细做。如1944年2月16日《解放日报》刊登的《小米怎样吃才好》一文介绍,小米有18种作法,细作后的小米易于消化,营养价值较高。这就大大提高了边区特产主食——小米的食用价值。特别是边区光华农场引进试种成功的蔬菜、瓜果、水果有30余种,“改变了边区群众的饮食结构,补充了群众的甜食来源”^②,食物中各种营养成分、维生素的增加,有利于群众的身体健康,大大提高了免疫力。

① 卢希谦、李忠全:《陕甘宁边区医药卫生史稿》,第19页。

② 阎庆生、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经济史研究(1937—1945)》,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7—58页。

以上这些措施逐渐改善了边区的卫生状况,使长期居高不下的人畜死亡率逐渐回落。

四 防治成效

在中共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下,广大医务工作者经过不懈努力,大大地改善了边区卫生面貌。表现在疾病的发生与死亡率的减少;表现在群众已能认识到卫生对于他们生活的密切的关系,注意与接受一般的关于卫生常识与设施的教育;更表现在群众对于医药科学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与信仰。因此,我们认为边区的防疫运动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一) 通过宣传教育,群众的卫生观念不断增强,许多老百姓能经常洗澡,洗衣,晒被子,逐渐养成不喝生水,不吃不洁食物的好习惯;村民生病也不再求神,而是主动到医院求治。村民们也开始认识到牲畜的圈棚也应该讲究卫生,注意经常打扫圈棚,牲畜生病也知道及时隔离的必要性。在群众逐步重视讲卫生的情况下,在卫生防疫工作人员的帮助带动下,模范卫生村和模范卫生家庭也相继出现。据《延安市半年来的群众卫生工作》统计,除模范医生和模范工作者之外,还出现了杨家湾、严家塔、南窑子、黑龙沟、高家园子 5 个卫生模范村;刘成义、高文亮、宋志忠等 17 个卫生模范家庭。据 1944 年上半年统计,延安市共挖厕所 783 个,平均每 4 户挖 1 个;挖垃圾坑 76 个,添修猪圈 100 多个,牲畜棚 130 多个,水井 19 个。食品商店、食品摊子纱窗防护设备。^①这些都说明,通过卫生防疫运动的教育,群众养成了讲卫生的良好习惯。

(二) 初步建立了卫生防疫体系。为扩大和巩固卫生防疫成

① 马豫章:《延安市半年来的群众卫生工作》,《解放日报》1944 年 8 月 13 日。

果,边区分别按系统和行业建立了各种类型的医院、医疗站、疗养所,各分区均设有较大的卫生院和医疗点,各县设有保健药社和卫生合作社,至抗战胜利每区实现了有一个卫生所,全区共有中药铺394个^①,还有防疫、妇幼保健等机构;八路军旅、团也设有医院,连队有卫生员,从上到下形成一个医疗网,即能及时医治伤病员,也广泛进行了医学研究和学术交流,培养了一大批医务人才,保证了人民的健康,提高了应对突发性疫病的能力,有力地支援了抗战,并为后来的卫生防疫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三)控制了发病率,提高了治愈率,降低了死亡率。下表是中央门诊部内科两年来诊病次数的比较,清楚地反映了内科感染病率在逐渐下降。

表2:中央门诊部1942-1943年内科诊病情况^②

项 目	1942 年	1943 年	减少次数	减少百分比
普通内科	7614	4141	3473	46%
急诊内科	2169	1587	582	27%
总 计	9783	5728	4055	41%

1942年陕甘宁边区卫生处所属各医院、所共接诊病人43000余人,治愈的占诊病总数当99.8%。卫生处门诊共诊治病人16418人(内科9368人,外科3857人,五官科3275人);1943年该处所属院所,门诊和住院的病人数为35370名,比上年减少病员近万名。又据住院病人统计,全年急性传染病以流行性感冒为首位,共407人,占急性传染病的60.6%;疟疾136人,占20%(均由前方带来),赤痢66人,占9%,其中伤寒26人,占4%。陕北最可怕而流行最广者为伤寒,但在1943年该处处只收治26名,完全治

① 卢希谦、李忠全:《陕甘宁边区医药卫生史稿》,第132页。

② 傅连璋:《1943年卫生处工作总结》,《解放日报》1944年3月1日。

愈,这是由于打防疫针、生活改善和体质增强的结果。^①下表是 1941—1943 年间中央医院传染科伤寒病例和全部传染病例的变化情况,也表明伤寒这种可怕的传染病已逐渐得到控制。

表 3: 中央医院传染科三年来病例变化情况^②

年 代	传染病例	伤寒病例	所占百分比
1941 年	126	102	82%
1942 年	256	56	22%
1943 年上半年	101	22	21.7%

刘景范在《陕甘宁边区防疫委员会五个月来的工作报告》(1942 年 6 月至 10 月)指出:1942 年全延安病人数目较去年仅中央医院收治的少一半还多(去年伤寒病人只中央医院一处共收治 133 例,1942 年全延安共发生 55 例)。去年伤寒病人大多数在 5 月及 9、10 月发病,今年则是自 4 月起至 8 月,是散在的发现,到 9、10 月反渐趋绝迹。^③这种从流行性到散发性再到绝迹,说明边区在预防传染病上是有很大成绩的。即使偶有发生者也不可怕,1943 年边区卫生处所属院所收治的 26 例伤寒病人完全痊愈,无一死亡。查这 26 例病人,五分之四是乡下来延安学习的干部和老百姓,五分之一是不肯打针者。^④这充分证明疫病是可以防治的。

总之,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克服了种种不利条件,积极开展卫生防疫运动,大力宣传文化卫生知识,不断提高广大群众的思想认识,边区各地逐渐形成了学文化,讲卫生的新风尚。大大改变了边区城乡卫生面貌,对保证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到了重大

① 通讯:《边区所属医院去年病员减少万名》,《解放日报》1944 年 2 月 1 日。

② 梁烈庭:《陕甘宁边区的卫生防疫及卫生运动》,《陕西卫生志》1985 年第 2 期。

③ 刘景范:《陕甘宁边区防疫委员会五个月来的工作报告》,《解放日报》1942 年 10 月 29 日。

④ 通讯:《边区所属医院去年病员减少万名》,《解放日报》1944 年 2 月 1 日。

作用。陕甘宁边区的卫生防疫工作,也为新中国的爱国卫生运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对今天的卫生防疫工作,也不无启迪。

(作者:温金童、李飞龙,河北大学人文学院
中国近现代史 03 级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李仲明)

《南京沦陷八年史》(上下册)

2005年7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经盛鸿著的《南京沦陷八年史》(上、下册),96.4万字。该书分十二章论述了沦陷前南京的人口与经济文教发展、日本在南京地区的挑衅与间谍活动、南京的沦陷与南京大屠杀、日本的“以华制华”政策与南京的伪政权、日伪时南京的社会控制与特务统治、日本在南京的殖民性经济掠夺、对南京的“文化大屠杀”与思想奴化、日军的“慰安妇”制度与南京的慰安所、日本的毒化政策与南京的烟毒、日军一六四四部队的秘密试验、驻南京的西方侨民及其对日抗争、南京地区的抗日斗争与南京光复。并附录了南京沦陷前后大事简记。